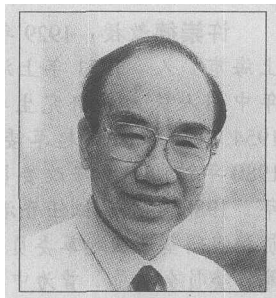


李步云教授，1965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畢業。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法理室主任、學術委員會委員、《法學研究》雜誌主編。現任該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李步雲教授： 憲法的穩定性與權威性

這次修改憲法，一些學者對“有無必要”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憲法和其他法律不同，應該強調其穩定性的意見是合理的。憲法的穩定性是保障其權威性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又應該從實際出發。我國憲法過去修改比較多，有客觀情況和條件。從1982年憲法到現在，24年中間，我們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社會處於轉型時期，這種改革力度很大、面很寬，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制度。因此，在這個力度很大、進展很快的大變化過程中，一些新的制度、政策，如果不能及時反映到憲法中，或者過去有些規定今天已經不適應，無論是哪種情況，如果實際情況變了，憲法不變的話，對憲法的權威性影響更大，對憲法的損害更大。實際生活是一回事，憲法又是另一回事，是不行的。這種情況是我國特有的，其他國家不是太多，這與我國改革發展的速度和深度相關。

因此，多次修改憲法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情況。

對於憲法是大改、中改、還是小改，我認為中央確定的“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必須要改的重大問題就改”這一比較穩妥的做法，是很

正確的。憲法的修改不應太大。實際上，如果改的太多，也很困難，究竟怎麼改，意見很難一致，儘管有些問題研究時間已經很長了，但統一思想不是很容易，需要有一個過程。所以小改的方案我是非常贊成的。

我們過去有一個很大的不足，就是沒有很好地利用憲法解釋這個手段，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行使這個解釋權。這一點我們沒有很好地利用起來，實際上如果某個條文規定的情況變化了，我們可以對這一條文作一解釋，基本的精神不變。美國的经验值得我們借鑒，美國憲法共七條，100多年沒有動，但有20幾個修正案。美國最高法院有解釋憲法的權力，非常頻繁，他們通過修正案、解釋，使得憲法與現實結合得非常緊密。我們的憲法中對解釋憲法有明確規定，只是我們沒有利用好。

在我國，執政黨每召開一次大會，一般都要修改憲法，有人對此有不同看法，我認為要考慮兩點，一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民主有一

個過程；其次，西方的政黨也會把自己的綱領寫到憲法中去，這樣的做法也是一種通例。關鍵在於在修改法律、特別是在修改憲法的過程中，要貫徹民主立法原則。

我在1982年為時任中央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葉劍英元帥起草第一次會議講話稿時，特別強調了兩個原則，一是民主立法，二是司法獨立。民主立法20多年來不斷進步。執政黨提出修憲建議之前，充分聽取專家、群眾和各界的意見，在黨內、黨外，特別是專家之間征求意见。我感覺這次的做法是很不錯的，我參加專家座談會的時候感覺非常好，氣氛很活躍，相互之間討論得很充分，負責這項工作的中央領導同志也發表了意見。而且迄今已經召開了六次較大範圍的座談會，反復醞釀。這種做法對未來的民主立法會起到很好的榜樣作用。

根據我現在的感覺，我相信未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定不會出現“一個字都不改”的狀況。

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對修改憲法提出的五個原則，即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几点我很贊成，比較全面。在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具體做法中，我對於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對人权的保护和尊重等等，



8月29日，呼和浩特市100多家私營企業帶着1000多個就業崗位參加下崗職工招聘會 李欣攝

都持乐观态度，寄予希望。比如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认为1982年宪法中已经规定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1982年宪法的有关规定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涵盖实际情况，公民的私有财产范围是比较广的，现有的规定相对面窄。

“三个代表”、“政治文明”、尊重和保护人权、私有财产的保护等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和讨论之后，通过民主法定程序，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写入宪法，我是赞同的。这个程序也是法律规定的。

我们国家总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进一步明确党的执政思想和方针，对我国的长期发展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比如“依法治国”1999年写入宪法，这是一个治国方略问题，现在的尊重和保护人权是法治国家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根据20年的实践，我们把这一条写进来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修改对未来经济、政治和文化，法制建设的进程等各方面将有深远影响。举个例子，比如尊重和保护人权问题，已经渗透在各个具体法律和制度之中。近年来变化是很大的，已经对我们的立法起到了指导作用，如刑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行政复议制度等的建立，都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宪法中的规定对立法和司法都会有很大影响，比如，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有一个理解法律的问题，所以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是很重要的，有利于立法者和执法者的观念的树立。我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宪法的重要性，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是学宪法，而且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20周年时作了非常好的讲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宪法的权威性将越来越高，将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

有感于“官儿不好当了”

●李 俭

“官儿不好当了”，这是近来南京、长沙等市上至市政府领导，下至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普遍感受。

这种感受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为两地分别实行了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这样的办法颁行以后，随即兑现。前不久，南京北河口水厂电器设备发生故障，造成南京城区大范围停水事故。按照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相关领导受到处理，代市长蒋宏坤还通过媒体向全市人民道歉。

不必讳言的是，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那“官儿”是极好当的，往透底里说，是极好混的。干好干坏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为不为民办事一个样，负不负责一个样，有无过错一个样，甚至于出现重大失误百姓多有微词，也可易地为官。

实践说明，在“官儿好当”的氛围中，必是谁都会当“官儿”、谁都能当“官儿”、谁都想当“官儿”、谁都奔当“官儿”。这正是：若商场上好赚钱，必是趋利者摩肩接踵；若官场里好当“官儿”，必然是奔“官儿”者趋之若鹜。这些年来，“卖官”、“买官”、“跑官”、“要官”、“骗官”者屡禁不绝，其原因之一，大抵在于那“官儿”太好当了。既然“官儿”好当，谁还不想过一过“官儿”瘾？更何况，在有的地方、单位，当上“官儿”的人，还有着类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富贵呢！这不正应验了那句“官儿好当，当官儿好，如今谁不把官儿跑”的市井之语了吗？

“官儿好当”，不光培植那种“官本位”的土壤，而且还会演绎出诸多弊端来。比如，为官者可以成为官场上的“踢球者”，仆人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将无从谈起。至于群众的利益，也可以不管或少管，因为管与不管、管得多与少、管得好与坏，“官儿”都可以照当不误的。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的问题，却多年得不到解决？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个“官儿好当”的弊端来。

“官儿不好当了”的境况大概就不一样了。在这样的氛围中，为官者不能不牢记当“官儿”的约束与规范、宗旨与责任，不能不掂量掂量自己当“官儿”的本事与能力、压力与危机。“官场”内的风气改变了，自然会辐射到“官场”之外。依我看，那些本不是当“官儿”的料，却绞尽脑汁想走“红道”的人，像那些千方百计“跑官”、“买官”、“要官”之人，就不能不有所收敛了。

两相比较，一般而言，在“官儿好当”的环境里“当官儿”，“官儿”们会养成惰性，还会从惰性演进成贪性，不仅对“官儿”们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而且最终危及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可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会培养出很多不好的“官儿”。而在“官儿不好当了”的体制下“当官儿”，由他律促成自律，“官儿”们会勤政廉政，不仅对“官儿”们的健康成长有好处，而且会使老百姓受益。可以说，在“官儿不好当了”的条件下，会培养出很多好的“官儿”。可以肯定，广大群众是巴望着“官儿不好当了”的体制的。这“官儿不好当了”的感受如果不仅在南京、长沙，而且在全国的各级人民公仆中普遍形成，那该有多好啊！当然，这感受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需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体制。□

